

(上接第11版)

#### 1978年

**3月~6月** 为尽快扭转“四人帮”造成的严重书荒现象,国家出版局两次组织全国十余个省、市和部分中央级出版社重印92种中外文学作品和科技书、少儿读物、工具书等共计4700万册,用纸1.3万多吨,集中于5月1日、国庆节前后在全国大中城市同时发行,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4月** 美国书商访华代表团一行16人到我国参观访问。此后,海内外出版、印刷、发行的交流活动逐渐增多。

**6月**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为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



辑委员会。不久后又成立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开始分卷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

**10月11日~19日** 国家出版局在江西庐山召开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不仅对少儿出版,而且对整个出版界的思想解放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1979年

**6月17日~7月1日** 陈翰伯率中国出版代表团访问英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界访问英国的首个代表团。

**7月27日** 王选等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研制成功,输出了第1张中文报纸版面。(下转第15版)

新中国70年是中国出版业大发展、大变革的70年。在70年的峥嵘岁月中,中国出版业走出了一条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类别渐趋丰富,产业发展趋向多元的成长之路。

#### 四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出版70年,大致可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诞生1949年至1965年“文革”前。这一时期新中国出版从孕育、起步,到初具规模,产业类别为传统纸质出版物的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期刊出版,以及图书发行、出版物印刷、出版物进出口。

第二阶段为1966年至1977年,即从“文革”爆发至“文革”结束后的初期,这一时期为新中国出版的低潮、曲折期。其间出版机构一度陷于瘫痪,书、报、刊出版品种骤减,除一些政治读物外其他出版物多销声匿迹。

第三阶段为1978年至2000年,即改革开放兴起至二十世纪结束。这一时期为新中国出版的复兴、崛起、快速发展期。不但书、报、刊纸质出版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还新增了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两个产业类别。

第四个阶段为2001年至今,即新世纪以来。这一时期新中国出版从高速发展走向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版权贸易、数字出版的进入,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产业类别,出版生产力空前发达,至2018年全国出版业实现营业收入27099.8亿元(含数字出版),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1%。

#### 图书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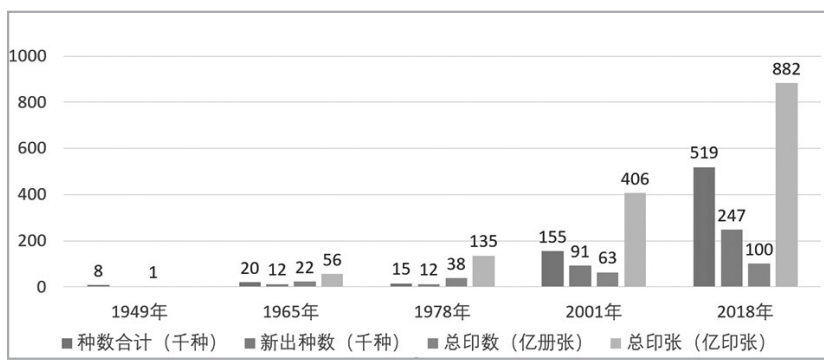
图书出版是即贯穿新中国70年全程,又具有旺盛生命力、持续发展的产业类别。

新中国诞生元年——1949年,全国出版图书8000种,总印数1.05亿册(张),按当年出书数量和全国人口计算,人均拥有图书0.19册,即约5个人分得一本书。而至2018年,全国出版图书519250种,总印数100.09亿册(张),历经70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增长63.91倍,年图书出版总印数增长94.32倍。按当年全国人口计算,人均拥有图书7.17册。从约5人1书到1人7书,历经70年全国人均拥有图书比1949年增长36.74倍。年图书出版总印张1950年为5.91亿印张,2018年为882.53亿印张,增长148.33倍。

70年间,全国共出版图书8188707种,其中初版新书4721031种。70年间,全国图书总印数累计达3281.91亿册(张),其中1950~2018年图书总印张累计达17832.43亿印张。这几个数据反映了新中国70年图书出版的总体规模,体现了新中国书业内容生产的总实力。

新中国图书出版第一阶段(见图1)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图书出版品种、总印数协调增长,处于良性循环中。即总印数增长大于品种增长。1949~1965年图书品种增长1.5倍,而图书总印数增长19.68倍——在图书品种增长的同时,图书单品平均印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长。这是图书出版的理想状态,在新中国出版70年中,这种状态是不常见的。

图1:新中国图书出版阶段示意图



新中国图书出版的第二阶段,1966年随着“文革”的爆发,图书出版遭受严重冲击,1966年图书出版品种同比骤降45.12%;1967年全年出书仅2925种,同比降幅达73.54%,出书品种甚至低于新中国诞生的1949年,为新中国70年出版史上的最低点。由于学校大多停课,正常教学不再,当年出版课本仅36种,同样为新中国出版史上的最低。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图书出版品种仍低于1965年。

新中国图书出版的第三阶段,是以改革开放起始年1978年的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大量重印为开端的。改革开放为被封闭、压抑了10年的图书出版开辟了新的天地,图书出版进入快速发展期:图书出版社从1978年的105家(不含副牌社),发展至2000年的528家,增长4.03倍,图书出版品种从1978年的14987种,发展至2000年的143376种,翻了3番多。图书总印数1978年当年就创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37.74亿册,到1999年再达新高73.16亿册,增长近1倍。图书总印张从1978年的135.43亿印张,发展至2000年的376.21亿印张,翻了一番多。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代表的一批重点出版工程在此期间完成,显示了中国图书出版前所未有的成就。

新世纪以来的第四个阶段,中国图书出版在调整中前行,在融合中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新世纪初,在图书出版品种持续增长的同时,图书出版总印数一度徘徊,经过出版业的不懈努力,这种状况得以扭转。近10年来,图书总印数从70亿级阶,上升至80亿级阶,再升值90亿级阶,直至2018年登上100亿级阶。其间除一年回落外,其余各年呈递增。十八大以来,图书出版一方面加大与数字出版融合的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现了再版重印率持续创新高、课本出版比重持续降低、图书单品平均印数提升等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图书出版是新中国出版业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支柱性产业类别,又是传统纸质出版物遭受网络阅读、移动阅读和数字出版冲击中,唯一保持出版总量上升的产业类别。作为新中国内容生产的主角,图书出版为新中国70年的建设、发展、改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图书出版要保持持续发展,要巩固近年来一般图书比重趋高,图书再版重印率提升的好势头,把精品生产放在首位,加大原创比重,提升单品印量。要积极推进图书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扩大图书内容转型产品在数字出版中的比重。针对文化消费升级的新现象和新一代读者的新需求,借助智能语音、音频、视频、AR、VR等新技术,大力发展“听书”等新产品,实现精品创作的多层次多形态传播。

图书出版要提高“原创率”“再版重印率”“数字化率”,优化品种结构,

压缩重复选题、力戒平庸选题,使产品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产品数量得到有效把控。要优化精品图书产品线,加大常销书出版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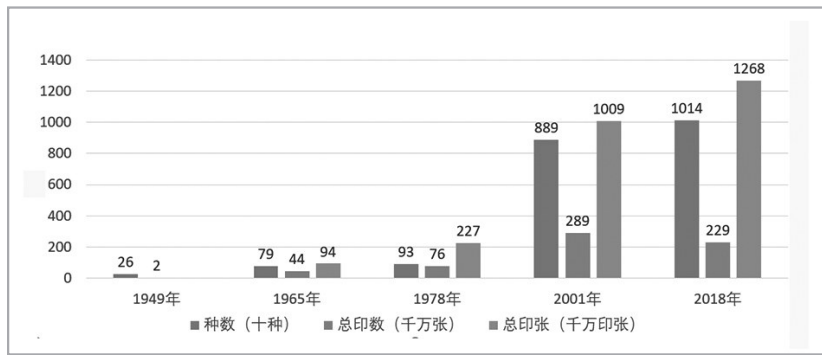
#### 期刊出版

期刊出版是又一个贯穿新中国70年全程的产业类别,作为中媒,它兼具长媒——图书的深博、传承和短媒——报纸的迅捷、时效之特征与功能,受众更为宽泛。而与图书和报纸比较,其70年的历程,可谓也居中间状态,即比图书更为曲折,但期末结局又稍优于报纸。

新中国70年,期刊出版品种从1949年的257种,发展至2018年的10139种,翻了5番多,出版总印数从1949年的2049万册,发展至2018年的22.92亿册,翻了近7番;出版总印张从1950年的7879万印张,发展至2018年的126.75亿印张,翻了9番多。只是由于发展曲折,2018年除出版品种为70年之最外,出版总印数和总印张均非70年最高点。总印数最高点和总印张最高点同在2012年,分别为33.48亿册和196.01亿印张。新中国70年,全国期刊总印数累计达1091.29亿册,总印张累计达8658.88亿印张。

期刊出版的第一阶段,曾在1958~1959年间达到峰值,品种达851种,总印数达5.29亿册,总印张达12.05亿印张。其后,虽然经历了三年的回落,但在期末已转为正常发展,总印数、总印张均达新高(见图2)。

图2:新中国期刊出版阶段示意图



第二阶段,“文革”爆发,《前线》杂志首当其冲,随之大批期刊被诬为“黑刊”而停刊,至1969年全国仅存期刊20种,跌至新中国70年期刊品种谷底。其后虽然期刊出版出现转机,但至期末,期刊品种仍低于上阶段期末。

第三阶段是期刊发展的黄金期。改革开放,不仅“文革”期间停刊的期刊纷纷复刊,还有大量新刊涌现。期刊品种不断攀升,品种级阶不断刷新:1979年跨上1000级阶,次年1980年即升至2000级阶,1982年再升至3000级阶,1985年升至4000级阶,次年1986年再升至5000级阶,1989年又升至6000级阶,10年跨升6个级阶。之后1993年升至7000级阶,1999年升至8000级阶,至期末2000年,全国期刊出版品种已达8728种,总印数达29.46亿册,总印张达100.04亿印张,均创新中国期刊出版最高。

第四阶段,期刊发展渐显曲折,2001~2012前12年,出版总印数递增,期刊品种、总印数虽有几度回落,但总趋势为上升,2012年总印数、总印张均创新中国出版史上最高值。2013年期刊出版态势急剧逆转,除出版品种持续增长外,总印数、总印张均告下跌,而且持续6年一跌不止,2018年的总印数22.92亿册,总印张126.75亿印张,分别比2012年的峰值下降了31.54%和35.33%。这两个分别逾3成的下降,可谓期刊出版遭受的重创。好在值得庆幸的是期刊出版品种没有坠入这一逆势,仍呈年年递增,2015年首破万种大关,2018年更升至10139种,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期刊出版的划时代新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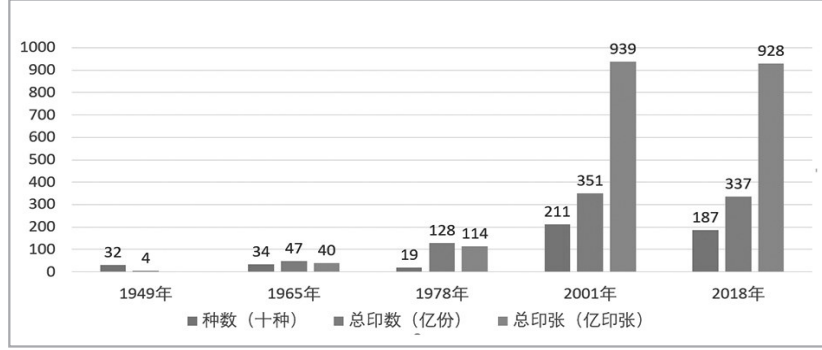
期刊受众广泛,几度辉煌,在新中国出版史上和全民阅读史上留下了许多名垂史册的优秀品牌期刊。近年来期刊出版的曲折态势,主因系网络阅读、移动阅读兴盛的冲击所致。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期刊作为纸质载体读物逐渐被弱化,恐为大势所趋,难以扭转。但近年来期刊出版品种的持续递增,又传递出当下大众多样化的阅读、文化需求不减的信号。期刊出版应顺势利导,一方面对产品分类施策,强化品牌期刊的生命力,加大对科技期刊的扶持力度,做好对新增量期刊的培育;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期刊数字化,加快期刊内容与数字化载体的融合,加大对互联网期刊的投入和建设。

#### 报纸出版

报纸出版同为贯穿新中国70年全程的产业类别。报纸出版兼具新闻、出版两种功能,曾为纸质出版中的最大比重。比较图书出版和期刊出版,报纸出版的特点是品种少,印量多,节奏快。

新中国70年,报纸出版品种从1949年的315种,发展至2018年的1871种,增长4.94倍;出版总印数从1949年的4.12亿份,发展至2018年的337.26亿份,增长80.86倍;出版总印张从1950年的6.5亿印张发展至2018年927.90亿印张,增长141.53倍(见图3)。70年间,报纸出版品种的最高点为2002年的2137种;报纸总印数的最高点为2013年的482.41亿份;报纸总印张的最高点为2011年的2271.99亿印张。新中国70年,全国报纸出版总印数累计达14265.63亿份,总印张累计达36862.09亿印张。

图3:新中国报纸出版阶段示意图



新中国报纸出版的第一阶段和图书出版、期刊出版一样,在1961~1963年因国家经济困难,压缩出版物用纸,而出版量下降,之后出版量回升,但期末1965年并非第一阶段出版的最高值。这一阶段的品种最高为1958年的491种,总印数、总印张最高分别为1960年的50.88亿份和47.84亿印张。

第二阶段,和期刊一样,“文革”中许多报纸停刊,报纸出版品种骤降,1968~1970年间的42种成为新中国报纸出版的谷底。而报纸作为传播信息和政治运动的需要,这一阶段的后半期总印数、总印张处于增长状,且高于上一阶段期末。

第三阶段同样为报纸出版的“黄金期”,出版品种从100量级增至1000量级,再增至2000量级;总印数从百亿量级增至200亿量级,再增至300亿量级;总印张从百亿印张量级增至200亿、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直至近800亿量级。

第四阶段,为报纸出版发展的大起大落曲折期。前期报纸出版增势强劲,一度成为进入新世纪后纸质出版规模持续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在书、报、刊三大出版中系增长最为稳定的。其回落既有压缩整顿的原因,更有新媒体冲击的原因。出版品种自2002年达到峰值后,逐渐回落,总印数、总印张分别于2013年、2011年达到峰值后,逐渐回落。2018年的出版品种1871种,总印数337.26亿份,总印张927.90亿印张,分别比各自的峰值下降12.45%、30.09%和59.16%。

报纸出版曾为传统纸质出版的最大门类,在传播信息、知识、文化中发挥了短平快作用。但它作为短媒,又在网络阅读、移动阅读的兴盛中首当其冲,遭受最严重的冲击。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作为纸质载体的报纸逐渐被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基于其功能,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报纸不会消亡。报纸要生存发展,就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激活内生动力,与新媒体进行差异化竞争,以内容质量取胜;一方面要推进与数字载体的融合、嫁接,在数字报纸上有新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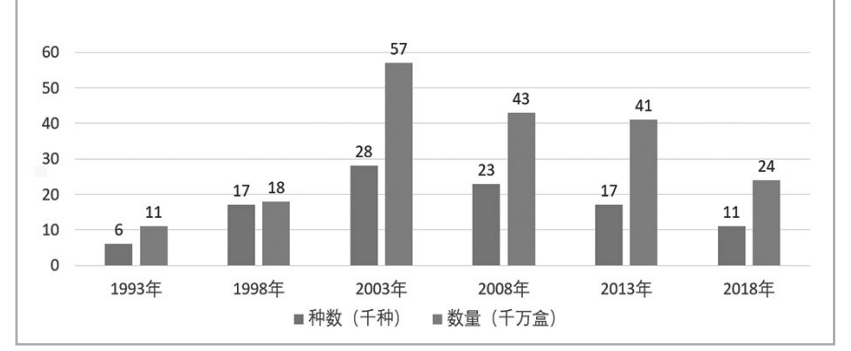
#### 音像制品出版

新中国音像制品的出版,可追溯至新中国初期的唱片出版。我国唱片出产起始于1904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唱片业进入新的发展期。50年代先后成立了人民唱片厂、上海唱片厂和中国唱片厂,出品“中国唱片”、“人民唱片”等品牌唱片。1957年成立了中国唱片社(后更名为中国唱片总公司)。这些唱片出版制作机构出版了大量优秀的音乐、戏曲、曲艺唱片,年出版品种曾达近3000种,发行量逾1100万张。1958年和1966年,我国先后自行研制开发了密纹慢转塑胶唱片和塑料薄膜唱片。

改革开放后,我国音像制品出版曾取得长足发展,丰富了新中国出版产业类别。1979年开始出品立体声盒式录音带;随后80年代推出录像节目带;1987年开始出品激光唱片(CD)、激光视盘(LD);1995年数码激光视盘(VCD)诞生,2000年,高密度激光唱盘DVD-A和高密度激光视盘DVD-V诞生,音像制品的载体更多,科技含量更高。

由于统计上的原因,现官方发布的新中国音像制品统计起始于1993年,至2018年,25年间音像制品出版走出了一条攀升——回落的轨迹(见图4)。1993年,音像制品出版品种57168种,出版数量1.12亿盒(张),之后出版品种和数量总体上升,至2005年达到最高点:出版品种34961种,出版数量6.16亿盒(张)。此后,2006年音像制品出版开始回落,其间虽偶有反弹,但总体跌势不止,至2018年出版品种降为11063种,出版数量降为2.41亿盒(张),比音像制品出版最高点品种降低68.36%,数量降低60.88%。

图4:新中国音像制品出版阶段示意图



音像制品出版作为与改革开放同步兴起的产业类别,其产品曾深受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只是其兴盛期不足30年就开始走向衰颓,且颓势显强,这是新技术更迭、数字出版兴盛所致。如果说数字出版对纸质出版冲击尚有一个缓冲期,来日方长,那对音像制品出版的冲击可谓正面交锋,日渐“白热化”。在线和移动载体正逐步取代磁带类、光盘类载体。音像制品的生存在于要扬长避短,扩大语言类产品的比重,减少与数字出版中娱乐性产品的正面冲突,并在发展“听书”中有所作为。

#### 电子出版物出版

电子出版物出版系出版产业中最小的产业类别。我国电子出版物出版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产品为只读光盘(CD-ROM)及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

电子出版物作为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传媒,以其独有的“交互式功能”,为许多受众喜爱。电子出版物虽然产业比重小,但其发展速度领先于其他产业类别,本世纪前10年其出版品种和出版数量曾分别翻了两番多(见图5)。网络出版的崛起,使电子出版业首当其冲,而尤以网络游戏对游戏类电子出版物的冲击为甚。网络出版的海量、及时、便捷,是有形载体的电子出版物所不及的,因而导致近几年来电子出版物出版品种和数量的下降。

(下转第15版)